

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出路

王俊生

摘要：由于朝鲜对自身的主要安全威胁来源判断在于美国，同时对中俄两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放心，即使朝鲜获得了中俄两国的安全保障，在没有得到来自美国的可信任的安全保障前，也不会放弃核武器。因此，朝鲜可以接受的实现国家安全的替代性选择就是“有美国参与的相关大国提供的可信任的安全保障”。

在第二次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后，中、美、朝、韩、俄、日六方经过短暂的协调与磨合后，很快建立起了东北亚地区危机管理和热点问题处理的新模式——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模式。尽管时至今日仍没有成功促使朝鲜“弃核”，但事实上，以中美为主导，有日俄韩等国参与，以控制地区危机事件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为目标，依托有可能孕育为地区安全机制的六方会谈架构，进而各方有张有弛地相互协调。尤其是这一切抛开意识形态色彩、在各方平等的基础上，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仅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近代东北亚历史上的新现象，对深化中美互信、弱化地区冷战格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在目前朝核问题发展的十字路口，评估共同管理的前景、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就变得异常重要。

朝核问题迄今没有成功实现共同管理的原因虽然可以列举许多，比如美国的前后政策不一、韩国李明博左翼政府的上台、日本多次把双边问题带进来等等，但其最直接原因还得归源于多边共同管理并没有满足朝鲜的根本需要。因此，探讨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出路应以分析朝鲜在这一议题上的目标需要为基础。

事实上，平壤的外交思路有轨可循。尽管为主导未来半岛统一添加筹码也是其重要目标，但目前朝鲜的首要目标需要还在于国家安全（政府或政党安全）。朝鲜顶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多次发射卫星和两次进行核试验，不仅挑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也多次让中国下不了台阶，更使自己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而这看似非理性“疯狂”背后的逻辑基础正在于朝鲜的安全需要使然。

客观上说，朝鲜一再出尔反尔，在全世界的一致反对声中在“核武”道路上却渐行渐远，有其莽撞和无赖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社会极少有国家像朝鲜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安全危机。对外，朝鲜长期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受其经济封锁和政治打压。尽管朝鲜有时对其示好，但美国却一直没有改变敌视战略。比如为释放善意，朝鲜2008年还炸掉了宁边的冷却塔，做出“去功能化”的“弃核”姿态，但结果并没有换来美国的对等让步，经济援助一再落空。日韩作为朝鲜的近邻，政策上一直追随美国，使朝鲜更孤立无援。尤其是李明博上台后，废除了“阳光政策”，对朝强硬。由于人质绑架等问题，日本民众对朝鲜这个邻居更加厌恶和敌视，动辄就对朝鲜进行制裁。而在内部，朝

鲜人民近些年一直生活在贫困和饥饿当中，与韩国的总体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美日韩三国不仅结成同盟进行制度化的军事演习，同时在朝鲜内部遭遇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其和平演变。

这种背景下，朝鲜切实存在极度的不安全感。在西方国际社会将其描绘成“无赖国家”的同时，其也真切地认为当今世界是“帝国主义”当道。朝鲜实现安全的手段与优先次序大致可以做以下区分：第一，和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彻底解决最大的外部威胁；第二，拥有核武器，基本可以排除他国对其的进攻；第三，有美国参与的相关大国对其提供可信任的安全保障；第四，没有美国参与的相关大国对其提供的安全保障；第五，对外局面仍得不到突破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先军政治”，国内“铁板一块”。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获得安全保障的途径无非有内外两个路径。日韩两国国内同样有发展核武器的声音，但核问题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同理，冷战期间，朝鲜的安全保障也来自于外部（主要是苏联）。因此，那时并不存在所谓的“核问题”。而只有到了冷战结束内在安全保障缺失，而外在安全保障又失去的情况下，朝鲜核问题才浮出水面。因此，在“拥核”美军常驻韩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到底是内部“拥核”才能自保，还是获得外部的安全保障，对于金正日应该是同等重要的议题。比如，一直致力于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想获得其“互不侵犯”的保证，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获得外在安全保障的努力。也就是说，在“拥核”的目标之下，朝鲜一直存有安全保障的选项。

这个选项又可以分为两个：其一，在美国不愿意与其建交的情况下，有美国单独、或者美国联合其他大国（比如中俄），为其提供可信任的安全保障。其二，美国既不愿意与其建交，也不愿意给予其安全保障，仅仅有其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朝鲜对于两者的态度应做理性的分析。先看后者，一方面，俄罗斯毕竟不是苏联，实力已大大减弱，和美国较量已占下风。比如，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其传统盟友南联盟的军事打击也不得不吞下苦果。而且朝俄两国意识形态上的战略依存关系也早已不存在，俄罗斯是否为其“两肋插刀”显然值得怀疑。因此，朝鲜虽然对俄罗斯有所借重，但显然不会将国家安全对其“托付”。另一方面，中国对内坚持和平发展，对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本质是承认并融入既有国际体系，与西方大国全面和解，目的在于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是否真的甘冒“保护邪恶轴心”的国际批评对其提供保护，朝鲜显然存在疑问。尤其是中韩紧密经贸关系与频繁民间往来的情况下，朝鲜将安全保障“外包”给中国显然并不放心。由此可见，在这两个选项上，朝鲜的优先仍是有美国参与的安全保障。而至于后者，显然是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朝鲜的以上诸多选项，主要还在对外方面，这也是历史上小国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选项。但不可否认，在冷战结束至今的近20年内，朝鲜能以小搏大还得提及其国内的高度稳定。作为内外均举步维艰的国家，如果内部民心不稳，政权很可能会一夜间“坍塌”。而反之，则会出现令外部有所畏惧的“同仇敌忾”。如果以上外在路径均不能打通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国内统治，比如继续坚持“先军政治”、限制国民的自由移动与迁徙、对媒体高度管制等等，国内会继续“铁板一块”，使得其他大国投鼠忌器——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愤怒的朝鲜人民为敌。事实上，朝鲜两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事先

应该就内政、外交层面进行过审慎的思考，而加强国内政权稳定始终应是一个重要的动因。比如2009年的这次核试验，就内政而言，在平壤政权面临最高权力交替之际，核试爆显然有助于加强民众的凝聚力。

对于朝鲜，以上五个选项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在拥有前者的同时，如能再拥有后者，再好不过。比如，既实现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又能成为核国家，同时又获得大国的安全保障，国内又保持超级稳定，朝鲜的安全问题基本能一举解决。又比如，在没有获得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如果既能拥有核武器，又能获得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安全保障，国内也超级稳定，其安全问题基本上也不会再出现大问题。而这五个选项对于朝鲜的吸引力，在维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前者优先于后者。也就是说，如果让朝鲜在前四个选项中只能选择其一，如果第一选择不能实现，那么优先选择第二；第二不行，接着优先选择第三；以此类推。

这五项选择的可能趋势，就目前来看，近期内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基于国家利益原则与过去一贯的政策，在这一议题上的利益相关国又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赞成其拥有核武器，因此前两项选择并不现实¹。而第五项朝鲜国内政治稳定，基于朝鲜与外界联系较少，国内稳定也符合相关国家（比如中俄）的利益，目前的“超稳定”现状近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对于朝核问题的共同管理，可以进行的选项只有第三与第四，也即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如前所述，由于朝鲜对自身的主要安全威胁来源判断在于美国，同时对中俄两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放心，可以预期的是，即使朝鲜获得了中俄两国的安全保障，在没有得到来自美国的可信任的安全保障前，也不会放弃核武器。因此，朝鲜可以接受的实现国家安全的替代性选择就是“有美国参与的相关大国提供的可信任的安全保障”。换句话说，在不会武力解决的情况下，这也是能够满足朝鲜、促使朝鲜和平“弃核”的现实路径。

在以上判断的基础上，朝核问题要实现成功的共同管理，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阻止朝鲜在“核武”道路上愈走愈远；第二步，促使其往“弃核”的方向发展。对于第一步，面对朝鲜已经“拥核”的既成事实，共同管理参与方应重点做到以下几方面：第一、要防止朝鲜未来不再继续进行核试验。第二、要防止朝鲜不再扩大和深化其已经拥有的核技术。第三、要防止朝鲜不将其已拥有的核技术和产品对外扩散，包括扩散到一些可能对世界和平具有威胁的国家²。而要做到这几项，还必须以“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为原则，对朝鲜的配合给予鼓励，建立互信。而其他相关方的配合应集中在增加朝鲜对国家安全保障的信心上。同时，各国要相向而行，让朝鲜感知到违背集体决议将带来的集体压力。只有实现了这三点，才能为下一步的成功促使朝鲜“弃核”提供可能。

要成功共同管理朝核问题、促使朝鲜“弃核”，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对于一个参与方彼此关系相当复杂、十分松散、甚至多少带点临时性质的多边解决框架，如果没有实际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随时都可能走向解体——正如过去几年多次处于瘫痪的那样。这就要求不管在学理上是否承认，中美两国都应继续承担共同管理的领

¹ 当然，这里并不分析朝鲜能否最终成功利用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最终实现成功“拥核”，只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2851>

导角色，不要因为各自的利益考虑而指望对方国家单独负起责任，自己仅仅收获“红利”。如果美中两国缺乏魄力和远见，互相警惕而把包袱甩给对方，则平壤的“拥核”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一个巨大的变数将进入复杂的东北亚国际政治当中。

第二，必须有一个解决的平台。由于朝核问题的性质，从一开始爆发就不仅仅是朝鲜的内政问题，这和主权国家是否拥有独立主权无关，也与大国是否有干涉小国的内政之嫌无关。甚至在半个世纪前朝鲜战争爆发、乃至更早中日俄三国围绕朝鲜半岛多次爆发战争时，朝鲜半岛问题就不仅仅是朝鲜的内政问题。这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有关。因此，朝核问题爆发后，为了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就必然要求相关利益方参与。而为了确保各方参与的有效性以及使该问题更有效率的解决，最好应有一个相对制度化的平台。而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美朝双边对话”、“三方会谈”、“四方会谈”等都没有解决朝核问题。那么，可以基本认定比较有效的方式仍然是六方会谈。

第三，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可见，顺利实现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目标的主导权并不在中国手里，而是取决于美国。也就是说只有朝鲜的国家安全得到来自美国的保障，其才会重返“弃核”之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共同管理中，美国的主要做法是对朝鲜采取“用经济利益换取朝鲜弃核”的诱使手段，却一直回避为朝鲜提供“国家安全保证”的做法。这样的共同管理显然不能令“获取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的朝鲜满意。换句话说，要同时向朝鲜展示看得见的“大棒”和摸得着的“胡萝卜”，而且在大棒足够粗的同时，胡萝卜也要足够多，才能奏效。否则，对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朝鲜，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压力（除战争外），也决不会弃核。毕竟没有任何损失比得上可能失去政权的损失。

第四，在朝鲜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应该给予更多鼓励。共同管理各方应该反思经济制裁与政治打压对“弃核”目标的效用。从联合国的历史上看，从没有因为制裁而成功的先例，比如古巴。如上所述，对于朝鲜来说，生存安全都朝不保夕，而发展核武器被其视为是当前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与政治打压能让其“弃核”吗？制裁的结果不仅不能使朝鲜屈服，还会给朝鲜劳动党提供对外继续推行强硬路线、对内实行“先军政治”和“高压政治”的借口。

第五，不应将太多的其他问题带进共同管理进程。朝核问题本身就异常复杂，而朝核问题背后的朝鲜问题更是异常复杂。朝核问题共同管理的首要目标是要解决核问题，而非全部的朝鲜半岛问题。对于后者，不仅目前的共同管理“力有不逮”，而且会使得核问题本身也无法解决。比如，日本把绑架人质问题带进来，多次使共同管理进程节外生枝，陷入停顿。再比如，2008年12月六方会谈团长会没能取得成果，主要原因也在于韩国李明博政府改弦更张，把朝核问题和朝鲜内政挂钩。

总之，朝核问题属于朝鲜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外交筹码，如果国际社会在促使朝鲜“弃核”的同时，能从朝鲜安全需要的角度同时入手，朝鲜“弃核”之路或许会“柳暗花明”。否则，以六方会谈为平台的多边共同管理框架很可能像过去几年那样：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只换来了朝鲜核开发的时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